

# 古代石刻叙录(一)

北京图书馆金石组

石刻是我国悠久历史、发达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它与甲骨、铜器、竹木简、缣帛、纸张一样，是记录古代文字的重要物质手段。石刻文字数量巨大，涉及面广，资料内容丰富，只有纸张记载的材料可与它相比。

千百年来，我国对石刻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，一向十分重视，从北宋以来已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学科——金石学，对它进行综合的研究。所以，现在留下的撰述很多，只就专著统计就达一千余种，文章更是不胜枚举。

北京图书馆金石组是收藏石刻文字最丰富的单位之一，累计各种资料已不下十万件。尤其是时代较早、反映全貌的大量整张拓片，资料价值又比一般分割装裱的拓本高出一筹，更具特点。现在，为了使读者对北图所藏石刻资料的情况有一个概略的了解，我们拟选择一些比较精粹的拓本和拓片，以“石刻叙录”为题，连续在《文献》(丛刊)发表，以飨对此有兴趣的读者。

石刻叙录收集的范围，以辛亥革命以前的石刻为限；编辑的方法以时代为序，分别对各朝代中有代表性的石刻进行介绍，使读者对各碑缘起、碑刻内容、资料的搜集与研究、现存拓本与拓片的状况等有一个大概的了解。

## 一、秦代刻石

根据安阳殷墟发掘出土的石毁断耳、玉器等考古材料中已有雕刻的文字证明,我国石刻文字的萌芽时期是在商代;但是由于当时记载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,加之雕刻工具的限制,石刻未能发展。春秋战国之际,随着铁器的使用、钢的出现,工具有所改进,加上用铜铸字的困难、缣帛写字的昂贵,在使用竹木简的同时,刻字较多的石刻开始出现。河北平山中山国遗址出土的《公乘得守丘石刻》(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处:《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》,载《文物》1979年1期)、陕西凤翔县出土的秦献公时的《石鼓文》、秦武王时的《诅楚文》等,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作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石刻有了较多的运用,歌颂秦德的七种刻石,就是在这时建立的。这充分证明了石刻已从萌芽阶段进入发生时期,已开始被统治者正式用作为宣传的手段了。

### (1) 《石鼓文》

公元七世纪初,即唐代初期,在陕西雍县(今凤翔)发现出土,先置于田野,后被郑馀庆迁于凤翔府夫子庙存放;五代复又散佚,北宋司马池再把它运到凤翔府学保存,但已遗失一鼓,皇祐四年(公元1052年)复经向传师访求,方得以补齐。宋徽宗大观年间,蔡京将它取到东京(今河南开封)置于辟雍,后入保和殿侧之稽古阁,据说曾用金填其字,以示珍贵,永不复拓。金朝破汴京,又将它劫运中都。元时把石鼓置于大都的国子学大门内,历明、清至民国,六百余年未再移动。抗日战争爆发,马衡先生曾将它南迁峨眉,日本投降后经南京回到北京,现存故宫博物院。

石鼓文出土后，当即引起了重视。当时书家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等撰文推崇它的书法；诗人、文学家杜甫、韦应物、韩愈等则赋诗作歌（如《石鼓歌》等）以赞扬它的成就；欧阳修等编《集古录》强调其文物价值，把它列为石刻中最重要的遗物。此后历代学人，如宋人苏东坡、薛尚功、郑樵，元人潘迪，明人周进，清人阮元、震钧等都有论述。总之，研究者继起，论著日多。以近代著述为例，有马衡的《石鼓为秦刻石考》（见《凡将斋金石丛稿》）、马叙伦的《石鼓文疏记》（民国二十四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）、郭沫若的《石鼓文研究》（民国二十八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）、唐兰的《石鼓年代考》（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58年第一期）等等。他们的文章对石鼓文名称的论定、年代的鉴别、内容的分析等都有系统的考证，可资参阅。

关于名称，称其为“石鼓”者，仅据其外形命名，并不恰当，论其全貌尤其是从其内容分析，应称“秦刻石”较妥。

关于年代，向来意见纷歧，历代学人都自有看法，以其时间早晚为序，其代表性的作者为：宋董卣、程大昌认为是周成王时所作（公元前十一世纪）；唐代学者均认为作于周宣王时代（公元前827—前782年），为太史籀所书；近人郭沫若认为是秦襄公八年立西畴时所作（公元前770年）；宋巩丰认为是秦襄公以后、秦献公以前（公元前770—前362年）；清人震钧认为是秦文公东猎时所作（公元前763年）；近人马衡认为是秦穆公始霸西戎、天子致贺时所作（公元前695—前621年）；唐兰主张是秦灵公作吴阳上下畴时所作，应为秦献公十一年（公元前374年）；宋人郑樵认为是秦惠文王之后，始皇之前（公元前333—前222）；清人武亿主张为汉代；王闿运持晋朝说；俞正燮说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（公元446年）；金人马定国认为是西魏大统十一年（公元545年）西狩岐阳时宇文泰所作，如此等等。由此可见，对石鼓制作年代的鉴别，上下相差竟达

一千五百多年，真是莫衷一是了。但多数近代学者认为定名以郑樵之说，为“秦刻石”较妥。其年代，我们认为唐兰的主张较准确。他从考古、历史、文学、文字、书法等多方面进行分析，证据较充分。

关于内容，根据唐兰同志的考订，大意是说：由于周天子有使臣至秦，秦献公和它一起出游，首先修治道涂，然后到了吴阳，在这里先射鹿，后打渔，然后又上高原行猎、到鄠地大弥，最后从鄠地回来，经泃水而归的状况。该文以韵诗的形式，十首构成一组，格调似《诗经》。因此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，它是《诗经》的续篇之一。

关于石鼓文资料的收存问题。当其出土之后，在唐朝和北宋都有拓本问世，但保存至今者，唐拓已不可见，宋拓有数本，如明安国（安桂坡）就藏有三本，他根据其好坏的程度，分别定名为“先锋”（又称“前茅”）、“中权”和“后劲”，解放前流入日本。郭沫若在《石鼓文研究》中所附拓本，就是凭这个本子的照片影印的。南宋时无拓本，元、明、清时拓本增多，但翻本伪本亦不少，值得注意。

国内现存拓本以明拓为最早。北图藏有清拓多种，除拓本外，还有整张拓片。整拓中以“铁琴铜剑楼”旧藏、顾千里收校的乾嘉拓本为上，其中有何元锡、叶志诜、龚定庵题跋和何元锡的藏印者，更为宝贵。

## （2）峰山、泰山与琅琊台刻石

据《史记》记载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从公元前 219 年至 210 年的十年中，曾五次出巡省视，并刻石七次以颂秦德，它们分布于河北、山东、浙江等省区。公元前 219 年，始皇两次东巡，上邹峰山（今山东峰县境内）立峰山刻石；上泰山（今山东泰安市）立泰山刻石；上琅琊（今山东胶南县西南）立琅琊台刻石。公元前 218 年，东巡之罘（今山东福山县境内）立之罘刻石和之罘东观刻石。公元前

215年北巡至碣石(今河北昌黎县北)刻碣石刻石。公元前210年,南巡至会稽(今浙江绍兴南),立会稽刻石。

这些刻石的内容,简言之,皆颂秦德。但由于刻立的时间不一,地点也有异,其记颂的重点是有差别的:有的颂统一战争,有的颂所行政策措施,有的颂给人民的好处。现在,选其三块有遗石传世者,简介于下。

峰山刻石。峰山即邹山,又名邹峰山,为秦始皇第一次东巡时所刻立。原石已佚。五代南唐有徐铉的摹本流传。北宋太宗淳化四年(公元993年),郑文宝据徐铉摹本重新刻石,立于长安,现存西安碑林。该摹刻的现存最早拓本为明拓本。北图现存整张拓片中,经“铁琴铜剑楼”和顾千里校藏者有三种,均乾嘉时所拓,有的还钤有“瞿氏鉴藏金石记”等印章,至为可宝。

泰山刻石。为秦始皇第二次东巡时所刻,刻石先存岳顶玉女池后移碧霞元君祠。相传为李斯书。石四面刻,凡二十二行,行12字,前十二行是秦始皇辞,后十行为秦二世辞。宋人刘跋拓本得223字,可读者有146字。明华中甫、安国递藏本存166字,亦为好本。元拓本存有五十余字,明拓则只存二十九字了。乾隆五年,碧霞元君祠起火石毁,嘉庆二十年(公元1815年)访得时,仅存残石二块,共10字。北图现存十字拓本数种。其中以“铁琴铜剑楼”旧藏并有顾千里题跋的嘉庆道光拓本和有陆增祥、李慈铭等题跋的道光咸丰拓本较为珍贵。

琅玕台刻石,为秦始皇二次东巡时所刻。据《山左金石志》载:石高丈五尺(据工部营造尺,下同),下宽六尺,中宽五尺,上半宽三尺,顶二尺三寸,南北厚二尺五寸;西面碑中偏西裂寸许,前知县事泰州官懋让熔铁束之;秦始皇颂诗及从臣姓名久剥去,今所存者二世从官名及诏书十三行八十六字。后来铁束坏石没。民国十三年(公元1924年)诸城县教育局访得碎石后粘合,置于县署;解放后

移至山东省博物馆；1959年调归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。北图现存清前期和乾嘉整拓本数纸，其中毛子静于乾隆丙子（即乾隆二十一年，公元1756年）在厂肆购得之本最为少见，他曾亲笔题名说：“海内秦碑，此为最古”。该拓本还钤有“子静鉴赏”、“莫禽藏古金石”、“寿苏斋”、“覃溪审定金石”、“小松鉴赏”、“鲍康读过”等印章，至为珍贵。

## 二、西汉刻石

西汉王朝，虽是历史上统一强盛的时代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都很发达，但在石刻方面却没有什麼大发展，只是在秦刻石之后沿其体制有一些短小刻石而已。根据徐森玉先生的研究，现在所能见的西汉石刻，有拓本可见者约十种，有书籍记载者约四种，有人说是西汉刻石而实为伪刻者约十种（参见《西汉石刻文字初探》，载《文物》1964年5期）。实际上，故宫还藏有两种，另外1970年山东曲阜九龙山墓出土之黄肠石，上有刻字，也可作为这时期石刻文字研究。

（1）鲁孝王刻石。又称五凤刻石，金明昌二年（公元1191年）重修孔庙时，得自鲁灵光殿基西南之太子钓鱼池。它是我国继居摄两坟坛刻石后出土最早的古西汉刻石之一，现存曲阜孔庙。该石正方形，隶书三行，行四字至五字不等，文曰：“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”。五凤系汉宣帝年号，二年为公元前56年。该石拓本以故宫博物院所存的明拓本最佳。北图拓本以钤有“铁琴铜剑楼”、“启甲审定”等印的乾嘉拓本为上。

（2）上谷卿、祝其卿坟坛刻石。这是我国出土最早的古西汉刻石。北宋赵明诚在《金石录》中已有记载。相传该石原在孔子庙前，清雍正十年（公元1733年）移置孔庙，现在曲阜孔庙。

上谷卿坟坛刻石,据《金石萃编》载,横方形,石广九寸五分,高六寸五分,前二行三字后二行四字共 13 字。文为:“上谷府卿坟坛居摄二年造”。居摄为西汉孺子婴年号,二年为公元 7 年。

祝其卿坟坛刻石,据《金石萃编》载,横方形,广七寸八分,高六寸,字四行,行三字共 12 字,文为:“祝其卿坟坛居摄二年二月造”。

两坛现存资料多为清拓本。北图藏品中以钤有“顾氏所收石墨”和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章的嘉庆道光拓本较为珍贵。

(3) 莱子侯刻石,清嘉庆二十二年(公元 1817 年)颜逢甲等发现于山东峰山西南的卧虎山前。石方,隶书,凡七行,行五字,共 35 字。文为“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,莱子侯为支人为封,使诸子食等用百余人,后子孙毋坏败”。始建国、天凤为王莽篡国后的年号,三年为公元 16 年。北图拓本曾为顾千里等收藏,并钤有“瞿氏鉴藏金石记”等印章。

西汉刻石,虽发现数量不多,但其文字对于研究篆书和隶书的继承,秦隶和汉隶的分别,以及汉隶和所谓八分书的关系等问题,都有重要的意义。

(执笔人:徐自强)

